

### ◆ 拜织女学女红

“天皇皇地皇皇，俺请七姐姐下天堂。不图你的针，不图你的线，光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段。”这首民谣道出了古代女子七夕拜织女学艺的习俗。

古代女子为什么要七夕拜织女呢？织女，别名七星娘娘、七星娘、天仙娘娘，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位女神，职责是编织云雾，是个纺织业者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：“维天有汉，监亦有光。跂彼织女，终日七襄。”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婺女，其北织女。织女，天女孙也。”《后汉书·天文志》：“织女，天子真女。”也有人称她是中国古代的拿兹氏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首领，在距今三万年前就发明了用树皮搓绳的技术。她发明的绳有三种：单股的绳称作“玄”，两股合成的称作“兹”，三股合成的称作“索”。后人尊奉她为女帝，又称玄女、玄帝、王素、素女、须女、帝舜姒等。还有人认为，织女实有其人，姓张，大家闺秀，诗经记载“役夸父”，即为夸父做事。无论哪种说法，织女是一个纺织高手是没有疑问的。美丽、勤劳、聪慧与善良的织女，成了中国女性崇拜的偶像。

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织女要在鹊桥与牛郎相会，只有在此时才能见到她，于是年轻女子们设香案祭拜，请求传授女红技艺。古时候，无论是大家闺秀，还是穷人家的孩子，都要精通女红。女红指女子所做的针线、纺织、刺绣、缝纫等“针线活”。男子择妻的标准，也以“德、言、容、功”等四个方面来衡量，其中的“功”即为女红活计。

古代拜织女大多是少女、少妇们，由一个有威望的女子牵头，邀上左邻右舍的姐妹们，少则五六人，多则十几人，团拜织女。这一天，要斋戒一天，沐浴净身，打扮得既庄重又漂亮。到了晚上，都来到主办人的家里。此时，月光融融，清辉尽洒，夜风习习，凉爽宜人。在庭院中安上一张供桌，上面摆上茶、酒、水果、五子(桂圆、红枣、榛子、花生、瓜子)等祭品。因为织女是个美女，所以还要在瓶子里插上几枝鲜花和几束红纸，前面放置一个小香炉，插上几炷香。大家在案前焚香礼拜，面向织女星座，神情严肃，虔诚祷告，心情专注，默念着心中所想之事，许愿道：“乞手巧，乞貌巧；乞心通，乞容颜；乞我爹娘千百岁，乞我姊妹千万年。”祭拜完毕，大家一起围坐在桌前，一面吃花生，瓜子，一面家长里短地闲聊，交流针线活。

唐人林杰也有《乞巧》诗云：“七夕齐看碧霄，牵牛织女渡河桥。家家乞巧望秋月，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清代诗人蔡云也有诗曰：“几多女伴拜前庭，艳说银河鹊驾翎。巧果堆盘蛩负腹，年年乞巧斫双星。”

### ◆ 秀女红比才艺

“星寥寥兮月细轮，佳期可想兮不可亲。云衣香薄妆态新，彩辔悠悠度天津。玉幌相逢夜将极，妖红惨黛生愁色。寂寞低容人旧机，歇著金梭思往夕。人间不见因谁知，万家闰艳求此时。碧空露重彩盘湿，花上乞得蜘蛛丝。”唐代诗人刘言史的《七夕歌》描写了女子于七夕秀技巧的情景。古代的七夕通常是少女少妇大秀女红、比拼才艺的时候。

乞巧习俗起源于汉代，东晋葛洪《西京杂



《月曼清游图册》之七月桐荫乞巧。(清)陈枚作

# 七夕

# 中国古代的“女儿节”

郑学富

从大量的古籍记载来看，古代的七月初七，并不是现代男女热捧的“情人节”，这一天所有的活动

都是以女子为中心大秀技巧，或拜织女学艺，或开展技巧比赛，或逛乞巧市场……活动丰富多彩、形式

多样。在笔者看来，古代的七夕与其说是“情人节”，不如说是“女儿节”更为适宜。

记》有“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，人俱习之”的记载。七夕之夜，女子手持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九孔针(或五孔针、七孔针)，借助月光，连续穿针引线，将线快速全部穿过针孔者称为“得巧”，即获胜。反之则是输家。输家还要准备奖品或礼物，颁发给胜者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：“七月七日为牛郎织女聚会之夜。是夕，人家妇女结彩楼，穿七孔针，或以金银铜石为针，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，以乞巧，有喜子网于瓜上，则以为符应。”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：“七夕，宫中以锦结成楼殿，高百尺，上可以胜数十人，陈以瓜果酒炙，设坐具，以祀牛女二星，妃嫔各以九孔针、五色线向月穿之，过者为得巧之候。动清商之曲，宴乐达旦。士民之家皆效之。”南朝梁时的诗人刘遵有《七夕穿针》诗：“岁月如有意，情来不自禁。向光抽一缕，举袖弄双针。”描写了穿针女子在花前月下，以穿双针争强斗巧的情景。唐人祖咏在《七夕》诗中道：“闺女求天女，更阑意未阑。玉庭开粉席，罗袖捧金盘。向月穿针易，临风整线难。不知谁得巧，明旦试相看。”

明清时期更加流行的是投针验巧，即在水盆中放入缝衣针，以盆底针影形状判断是否“得巧”。《燕京岁时记》记载：“京师闺阁，于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，各投小针，浮之水面，徐视水底日影，或散如花，动如云，细如线，粗如椎，因以卜女之巧拙。俗谓之丢针儿。”在七月初六，

就把一个水盆放在院子里，倒入“鸳鸯水”。“鸳鸯水”是指把白天取的水和夜间取的水混合，或者是把河水和井水混合。露天过夜，第二天，再晒一上午，通过阳光的照射，水的表面依稀生成薄膜。到了下午，取出缝衣针轻轻地平放在水面上，针不会下沉，在水底下折射出针影。如果针影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，便是胜者；如果针影是笔直的一条线，就是败者。《帝京景物略》说：“七月七日之午，丢巧针，妇女曝盎水日中，顷之，水膜生面，绣针投之则浮。则看水底针影，有成云物、花头、鸟兽影者，有成鞋及剪刀、水茄影者，谓乞得巧。其影粗如槌、细如丝、直如轴蜡，此拙征矣。妇或叹，女有泣者。”

### ◆ 逛市场忙购物

北宋时期，七夕这天，连平日深居在绣楼里的大家闺秀、富家小姐，这天也要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穿上美丽的服装，到田园乡野游玩，逛逛街市，尽情购物。在京城汴梁专门为女子们设置乞巧物品专卖市场，即乞巧市，其繁华热闹盛况不亚于现在的大型超市。宋人罗烨、金盈之编辑的《醉翁谈录》说：“七夕，潘楼前买卖乞巧物。自七月一日，车马喧咽，至七夕前三日，车马不通行，相次壅遏，不复得出，至夜方散。”《东京梦华录》也有介绍：七夕前，身穿罗

绮者充斥街市，随即有折来尚未开的荷花，京城中人擅做假的双头莲，赏玩一时，然后又带回家去，路人见了，纷纷流露出赞叹喜爱的神情。从乞巧市场繁华热闹的景象，可看出当时七夕节的盛况。

宋代随着乞巧市场的繁盛，一些乞巧文创商品也应运而生。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：“七月七夕，潘楼街东门外瓦子、州西梁门外瓦子、北门外、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，皆卖磨喝乐，乃小塑土偶耳。悉以雕木彩绘坐座，或用红纱碧笼，或饰以金珠牙翠，有一对直数千者。”其中所记载的磨喝乐是梵文的音译，有时也译作“摩睺罗”。据史料记载，磨喝乐是穿戴着不同衣饰，形态各异，用土、木、蜡等原料制成的婴孩形祭祀之偶像。

在宋朝，磨喝乐是女子七夕祭拜的“宠儿”，这是由唐朝“花生”之俗而来，目的是盼生男孩。民间有歌谣唱道：“捏塑彩画一团泥，妆点金珠配华衣。小儿把玩得笑乐，少妇供养盼良嗣。”宋人不仅把磨喝乐作为供奉的偶像，而且还赋予其娱乐性，让孩子效仿磨喝乐的造型做游戏，成为七夕节最为时尚的民俗活动。《东京梦华录》描述道：“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，盖效颦磨喝乐。儿童辈特地新奇，竞夸艳丽。”童子手持新荷叶、莲蓬和未开荷花，也是有关好愿望的，借用佛教“鹿母莲花夫人”的故事，盼望能多生健康英俊男孩。

# 樊燮的“洗辱牌”

清风慕竹

湖南永州总兵樊燮是湖北恩施人，早年参军，略有军功。不过他能坐上总兵的位置，主要不是依靠军功，而是他与时任湖广总督曾家的五姨夫是姻亲，五姨夫很得曾家宠爱，樊燮自然也被爱屋及乌，官位随之水涨船高。

或许是因为有了靠山的缘故，樊燮的总兵当得相当骄纵。在永州城内驻扎的绿营兵有300余人，他们中有一半在官署当差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士兵虽然有着正式的编制，拿着国家的军饷，但每天干的活儿却不是军事训练和戍卫城垣，而是承包了樊燮家的厨夫、水夫、花匠、点心匠、剃头匠等仆役的工作。并且，樊燮治家如治军，稍有不如意，便军法从事。某次家宴，有位千总迟到，被当场棍责数十；一个千总年终算账，烧煤超过了预算，也被棍责数十。而真正在治军上，樊燮却没有了如此的用心，虽为武官他却几乎不骑马，只像文官一样坐八人大轿，被当地百姓送了一个外号“轿子总兵”。更过分的是，樊燮连阅兵都坐轿子，以致当地人流行了一句歇后语：“樊总兵阅兵——坐着看”。

咸丰九年(1859)，樊燮的贪纵行为被举报给了湖南巡抚骆秉章，当时幕僚左宗棠实际上掌管着湖南的军政要务，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，“所计画无不立从。一切公文，画诺而已，绝不检校”。左宗棠很快查清了实情，如实报告给了骆秉章，气愤地说必须弹劾樊燮的不法之事。于是一道奏疏飞往京城，参樊燮在任“违例乘坐舆扁，私役弁丁(兵丁)”。

官文知樊燮惹了篓子，便放下身段，命樊燮主动到长沙找骆秉章“认错”。此时正处于与大平军事对峙的

紧要时刻，骆秉章也不想与顶头上司官文弄僵，便令樊燮到师爷左宗棠处“请训”，意思是上门打个招呼，以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

没想到的是，樊燮却将左宗棠这个师爷放在眼里，见面后仅作揖行礼。左宗棠脾气火爆，本就看不顺眼，厉声呵斥道：“武官见我，无论大小皆要请安，汝何不然？”他所说的请安，即要行叩拜大礼。樊燮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淡定地回答说：“朝廷体制，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。武官虽轻，亦朝廷二品官也。”我的武官官职虽轻，也是朝廷的二品官，按照朝廷的体制，没有规定见到师爷要行叩拜大礼啊！

樊燮的话倒是没啥毛病，但其中对师爷的轻薄却击中了左宗棠的痛处。左宗棠虽然于道光十二年(1832)中了举人，但后来却屡试不第，没能捞个正式的官职，只能委身作个幕僚。这句话将左宗棠彻底激怒，他张口骂道：“王八蛋！滚出去！”跟着又上前狠狠踹了樊燮一脚。

樊燮虽然贪婪和骄纵，却是一个极爱脸面的人，受此大辱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，他一边向朝廷告发左宗棠羞辱国家二品官员，一边向官文诉说委屈，官文亦亲自具折参劾。咸丰皇帝接报很生气，甚至下了“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，即行就地正法”的密谕。后来幸得湖北巡抚胡林翼以及朝中要员郭嵩焘、潘祖荫等人全力斡旋与营救，最终咸丰弄清了原尾，下旨左宗棠著以四品京堂候补，协助曾国藩操办军务，而樊燮则被革除一切职务，滚回老家。

被人一顿臭骂外加一脚，最终又丢

了官帽子，樊燮的感觉只能用“羞愤难当”来形容。回到恩施梓潼巷老家，樊燮越想越生气：“伊区区孝廉尔，可气焰如此！”他誓言一雪此耻。樊燮在正屋的侧面修了一间两层的角楼作为书房，除教书先生与两个儿子外，其他人等一律不准登楼。原来他想的报复方法就是逼儿子读书，为自己争气。他的解释是：“左宗棠，一举人耳，辱我身，又夺我官……敬延名师，教子儿子，雪我耻辱。不中举人、进士、点翰林，无以见先人于地下。”

谁能想到，一介武夫想到的报复方式竟如此文明！为了让儿子对他所受的羞辱感同身受，樊燮在家里的祠堂立了个木牌，名曰“洗辱牌”，上书六个大字：“王八蛋！滚出去！”并将其立于先人的牌位之侧。每月初一、十五，他都要亲自带着两个儿子跪拜于“洗辱牌”前，焚香祭祀，让孩子们记住家耻，并令他们发誓：“不中举人以上功名，不去此牌。”他还命令两个儿子有所成就前须身着女装，要求是：“考秀才进学，脱外衣；中举人，脱内衣服；中进士，焚洗辱牌，告先人以无罪。”

在他的严格要求和激励之下，大儿子虽英年早逝，二儿子樊增祥却十分争气，发愤攻读，21岁考取举人，32岁高中进士。进士及第后，樊增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樊燮的坟前烧掉“洗辱牌”，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樊增祥也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诗人，官职曾任陕西布政使、署理两江总督，成为一代封疆大吏。孔子说：“知耻近乎勇。”知道羞耻并勇于改过，是一种值得推崇和夸耀的品德。一个人的一生中，难免因做错事情而受人批评甚至遭人羞辱，这样的羞耻可以让你自暴自弃，就此沉沦，但也可以令人激发出昂扬的勇气，成为蓬勃向上的动力。两种态度，两种结局，在这一点上，樊燮给我们演绎了一个另类的经典。

## 历史随笔

# 苏轼徐州抗洪的启示

讷言

北宋熙宁十年(1077)四月，苏轼赴徐州任太守。上任不久，便遇到洪水围城，苏轼率领军民奋力抗洪，城池安然无恙，百姓生命财产得以保全。细阅史料，苏轼抗洪举措，值得今人借鉴。

徐州地处淮河的支流沂、沐、泗诸水的下游，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，东南有骆马湖，西北有微山湖，地势低洼，境内河流纵横交错，湖沼星罗棋布，极易发生洪涝灾害。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，黄河决堤，河南濮阳至山东西南部一带，皆为泽国，灾情严重。苏轼得知这一讯息后，知道洪水不日即可抵达徐州，于是他启动防洪预案，立即采取四项措施：

一是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。苏轼立即全动员，组织民众拿土挖土、运土的工具，修补堵塞河堤上的洞穴隐患，并储存大量的土石、茭草、柴草，以备抗洪之用。

二是安定民心。八月二十一日，洪水如脱缰的野马，波涛汹涌，奔流而至徐州，淹到徐州的东、西、北门。此时，徐州又连降暴雨，水位急速上涨，“彭门城下，水二丈八尺”。危机之际，城内人心惶惶，一些富户欲携家带口出城躲避。面对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，苏轼一面加固城墙，防止洪水破墙而入；一面安定民心，他派出救济人员，让习水性的人驾舟船散发干粮，保证百姓洪涝期间不饿肚子，稳定波动的社会情绪。苏轼亲自做那些想出城避水的豪绅大户的思想工作，诚恳地对他们说：“如果你们出城，全城百姓都会动摇，百姓会倾城而出，还有谁和我一起抗洪守城？如果洪水进城，你们的家产也将不复存在。请你们放心，我在在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。”苏轼斩钉截铁的语言和义薄云天的豪情，打消了这些人的顾虑，他们决心留在城内，与百姓一起抗洪保城。

三是求助于军队。宋朝的禁军直属朝廷枢密院指挥，地方官员无权调动。险情紧急，如果再向朝廷奏报请调军队，路途遥远来不及，更何况当时水围城池已无法出城。为增强抗洪力量，无奈之下，苏轼亲赴军营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动员禁军主动积极参加抗洪。苏轼对卒长说：“洪水已经包围了徐州城，全城百

姓命悬一线，已是千钧一发之际，你们虽然是禁军，不属于我调遣，但是希望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，共抗洪害，保民平安。”卒长也被苏轼感动，毅然说道：“太守尚且不躲避洪水，临危不惧，我辈小人，理应效命。”于是，卒长带领士卒与百姓日夜奋战，在城东抢修起一道长堤，头起戏马台，尾连着城墙，长达九百八十四丈，高一丈，厚二丈，将凶猛的洪水阻挡在城外。

四是与民同甘共苦。抗洪期间，苏轼在城墙上搭起草庐，既是办公地点，又是夜宿之所，“夜闻沙岸鸣釜，晓看雪浪浮鲲鹏”。他脱去官服，身穿布衣，脚蹬草鞋，抱着“坐观人市卷间井，吏民走尽余王尊”的决心，誓与徐州共存亡，和军民一起奋战在抗洪第一线，多次过家门而不入。在军民的共同抵制下，十月初五，洪水退却，徐州转危为安。“旋呼歌舞杂诙谐，不惜饮酬空瓶瓮”，全城民众欢声雷动。

苏轼奋不顾身抗洪的事迹传到朝廷后，皇帝下旨称赞他：“亲率官吏，督驱兵士，救护城壁。一城生齿，并仓库庐舍，得免漂没之害。”

得到上下赞颂的苏轼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，他清醒地认识到徐州防洪的紧迫性和艰巨性。为了今后洪水不再泛滥成灾，百姓能安居乐业，他又做了两件事：一是上奏朝廷，请求免除徐州赋税，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“外小城”，以加固内城。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，次年二月，朝廷拨与苏轼三万贯，一千八百米粮，七千二百个员工用于防洪堤坝建设。二是修筑黄楼纪念抗洪胜利。苏轼看到徐州东门是防洪的要冲，不仅要筑城门筑堤堰不可破，而且还要在此建一座黄楼，以镇水患。按照五行之说，黄代表土，水来土掩。水灾刚过，木石匮乏，为了不增加百姓困难，苏轼便下令将官府内一处废旧建筑拆除，修建起一座百尺高的黄楼。

神宗元丰元年(1078)九月初九重阳节，黄楼落成，全城同庆，官民欢呼雀跃。此情此景，苏轼感慨万千，赋诗《九日黄楼作》，其中写道：“去年重阳不可说，南城夜半干沓发。水穿城下作雷吼，泥满城头飞雨滑。黄楼白酒无人问，日暮归来洗靴袜。皆知复有今年，把盞对花容一呷。莫嫌酒薄粉粉醲，胜胜泥中事辘轳。”